

##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欧盟对华政策分析

刘雪莲,章娟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欧盟对华政策在30余年的发展中发生了三个阶段性变化,并逐步走向成熟;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切入,提出了冷战至今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的四种模式,基于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的变动对欧盟涉华政策造成的不同结果,对未来10年欧盟对华政策的前景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 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欧盟对华政策;中欧关系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2)02-0095-06

欧盟和中国都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两者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欧双边关系是国际社会众多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支,在深受国际体系影响的同时,也对国际体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75年5月6日,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关系。在近30年的时间中,中欧关系经历了一个冷热起伏的复杂变化过程。在战略关系方面,中欧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建设性接触关系——全面合作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演变过程。分析中欧关系发展的历程:一方面,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欧政策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欧盟<sup>①</sup>受内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政策变化,直接影响了中欧关系的走向。无论是主动的与中国改善关系,还是主动的挑起中欧关系的矛盾,欧盟在中欧关系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动的角色。因此,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对中欧关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纵观欧洲对华政策变化历程,欧盟每一阶段的对华政策从根本上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体系背景而制定的,可见其决定对华政策走向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变化。迄今为止,伴随着国际体系从两极对峙——单极独霸——一超多强的历史变革,欧盟对华政策的演变也相应的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冷战

末期为在战略上联合制衡苏联,而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第二阶段,欧盟冷战结束后,欧盟为抗衡美国的单极独霸,同时迫切需要改善和提升中欧关系,赢来中欧关系的蜜月期;第三阶段,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美欧盟友关系的修复,2005年伴随着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的更迭,中欧关系走向动荡。因此,不同的国际体系背景决定了欧盟不同的对华政策。这也深刻地印证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结构界定单元的排列理论。综上分析,本文将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切入,重点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动带来的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的变动,以及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的变动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影响,并基于此分析,预测未来10年欧盟对华政策的走向。

### 一、当代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

著名国际关系大师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是全系统范围内的组成部分,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sup>[1]106</sup>,其中结构界定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或顺序<sup>[1]109</sup>,结构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方式来加以定义,只有排列方式的改变才是结构性改变<sup>[1]108</sup>。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系统划分为国际体系、主权国家、个人三个层次。他认为国际社会是由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有机组合而成,其中,体系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国际体系

[收稿日期] 2011-03-25

[作者简介] 刘雪莲(1965-)女,吉林吉林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娟(1984-)女,四川眉山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由于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存在着时间上欧共体和欧盟的先后之分,本文在涉及到具体事件和史实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称谓进行论述,但是在涉及到理论推理、分析时使用“欧盟”概念。

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和决定着国际事态发展的根本原因,国际体系的变化将从根本上影响国际事态的发展。

体系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所构成,结构决定了单元的排列或顺序,要素的排列方式不同带来的国际结构也不同。因此,国际体系决定了国际社会中各个层级的要素排列关系。国际体系的核心是国际格局,而国际格局下几个主要的力量大国的势力对比关系是由国际体系决定的,同时,大国间的力量组合的变化或者势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也将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方面,美、苏、欧、中等几个力量中心的排列组合模式是由当时的国际体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体系作用力下的美、苏、欧、中的组合模式不同,所带来的结构也不同,在此背景下的国际事态发展就会产生根本的不同。

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下,由于力量中心的组合模式不同,所带来的国际关系格局的不同,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国际体系背景定义出不同的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如果我们将国际体系的领导者看作一级力量中心,并定义为A;将国际体系的次级领导者看作二级力量中心,并定义为B;将国际体系中的曾经兴盛过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看作三级力量中心,并定义为C。从冷战时期至今,国际体系经历了四种力量中心组合模式。

#### (一) $A_1 + B - A_2 + C$ 模式

美国是  $A_1$ 、苏联是  $A_2$ 、欧共体是 B、中国是 C。冷战初期,以美国为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其中,美欧盟友是亲密协作关系,苏中阵营在多方面有着一致的立场和行动。因此,当时国际体系中力量中心的组合模式可以定义为: $A_1 + B - A_2 + C$  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美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中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必然处于对立的态势,双方在国际体系内展开激烈的争夺,在外交关系上呈现出紧张对立的态势。

#### (二) $A_1 + B + C - A_2$ 模式

进入冷战中期,随着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苏双方对峙进入苏攻美守的阶段。美苏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加剧了对峙形势的紧迫性,致使美欧阵营迫切的需要拉拢中国来平衡苏联增长的力量优势。在进行一番外交努力后,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的组合模式变为  $A_1 + B + C - A_2$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并以苏联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失败而告终。 $A_1 + B + C - A_2$  的模式大大颠覆了传统的  $A_1 + B - A_2 + C$  模式,使得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的排列组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最终带来了结构的变化。这正如华尔兹所分析的那样“结构概念建立于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

即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sup>[1]109</sup>。

#### (三) $A - B + C$ 模式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建立起一级独霸的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对外政策,致美欧离心力增大,此前牢固的  $A_1 + B$  的组合产生离心力。苏联解体致使国际体系  $A_1 - A_2$  的模式彻底崩溃,美国继续维持超强实力变为独一无二的一级力量中心:A。同时,中国经过 10 余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有所提高,成为新兴国家三级力量中心:C。在新的国际体系背景下,欧中逐渐接近,以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综合当时的力量中心势力对比的变化可以得出,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的组合模式演变为  $A - B + C$  模式。 $A - B + C$  模式是二级力量中心与三级力量中心通过联合来制衡一级力量中心的结果。这种模式将使得二级力量中心与三级力量中心通过加深了解、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双边或多边关系来制衡一极力量中心的优势力量。

#### (四) $A + B - C$ 模式

随着美国霸权实力的衰落,虽然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还可以维持在一级力量中心的范围内,但是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能力需要传统盟友的辅助和支撑,国际体系领导者 A 和次级领导者 B 的离心力被削弱。在领导集团既得利益的诱导下,次级领导者抛弃二级力量中心与三级力量中心合作模式,回到  $A + B$  模式。因此,2005 年左右,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变为  $A + B - C$  模式。这种模式下,传统领导同盟的协作关系将得到加强,同时,二级力量中心与三级力量中心的关系将走向疏离。

我们通过对冷战至今的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国际体系背景会带来不同的力量中心的排列组合,而力量中心不同的排列组合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事务的态势发生变化。中欧关系从起步到成熟的过程恰逢国际体系力量中心四种模式的组合更迭。因此,中欧双方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从理论上讲,中欧双边关系走向的根本决定因素是当时的国际体系,而其直接决定因素是当时体系下的力量中心组合模式的不同。因此,我们将从中欧双边关系的实际发展历程分析中欧关系变动过程中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国际体系主要力量中心的组合模式。

## 二、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对中欧关系发展历程的作用

1975 年,中欧关系开启并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1983 年 11 月,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在此中欧实现全面建交。

中欧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 第一阶段: 1975 - 1994 年, 中欧建设性接触的尝试阶段

自 1975 年中欧建交后, 中欧双方的接触明显增多, 政治关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75 至 1989 年, 中欧双方实现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互访与合作。期间, 欧洲议会议长科隆博、欧共体主席托恩及德洛尔曾先后访问中国; 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曾先后访问欧共体。这期间的中欧关系属于建设性接触阶段。中欧双方利益诉求并不多, 关系发展比较平稳缓慢。但引人深思的是, 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抗下, 一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团体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呢? 究其原因, 就不得不回到当时的国际体系层面。

中欧建交前后是美苏对抗渐趋紧张的时期, 形势上处于苏攻美守, 局面对资本主义阵营不利。这样的国际体系背景, 引发了资本主义阵营拉拢中国的意愿和行动。以美欧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意图是希望通过拉拢中国来制衡苏联。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 美欧日等国家与中国展开外交接触, 此后, 中美、中欧、中日均实现正式建交。1983 年 11 月, 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托恩访华时谈到“在美苏超级大国之间, 如果存在强大的欧洲和强大的中国结合起来的力量, 就能起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作用”<sup>[2]247</sup>。可见, 由于当时苏攻美守的对峙格局催生了资本主义阵营调整国际体系力量组合的需求, 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阵营一方的战略定位发生了转变。因此, 资本主义阵营联合中国达到对苏力量制衡的客观需要, 为中欧关系的开启带来了客观的战略驱动力。欧方的主动示好, 使得中欧得以建交, 并开始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展开了建设性接触。从上文提到的模式上看, 美欧拉拢中国的战略行动导致了冷战时期两极体系内的力量对比从  $A_1 + B - A_2 + C$  转变为  $A_1 + B + C - A_2$ 。在这一阶段中, 由于中欧都只是体系内一级力量中心的追随者, 双方都能不算是体系内举足轻重的力量, 因此双方加强战略接触与合作的意愿不强, 中欧关系仅处于接触性阶段。

(二) 第二阶段: 1995 - 2004 年, 中欧全面性接触的蜜月阶段

中欧关系的飞速发展开始于 1995 年欧盟委员会年发表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中国 - 欧洲关系长期政策文件》, 随后, 欧盟于 1998 年发表《建设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2001 年发表《欧盟对华战略》, 2003 年发表《日渐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 2006 年发表《欧盟——中国: 紧密的伙伴, 增长

的责任》。其中, 2003 年, 中国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 这也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第一份对外政策文件。在此 10 年间, 伴随着欧盟连续五个对华政策文件的发表, 以及中方的积极回应, 中欧关系由最初的建设性接触发展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双方在政治磋商、经贸合作、科研项目合作、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多领域形成了日常性合作和交流机制。因此, 这段期间是中欧关系发展历程中关系最好的时期。

中欧关系“蜜月期”的开始恰逢冷战结束不久, 国际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转向美国一极独霸。从当时的国际体系看, 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处于顶峰。在成功击垮了苏联这个巨大的绊脚石后, 美国终于成为整个国际体系名副其实的领导者。美国的国际战略视野也完全由原来的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主, 扩展到整个世界。与此同时, 美国将世界各地的政治与安全态势纳入到自己的全球战略棋盘中, 相对提升了除原来资本主义阵营以外的其他事务的战略地位。在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中, 其他地区和国家战略地位的提升也就代表了欧盟这个美国的传统盟友的相对地位下降, 这是美国巩固其霸主地位而必然导致的结果。并且, 美欧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 这使得美欧盟友关系开始出现了离心力。进入 21 世纪后, 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 在诸多问题上甩开欧盟单独行事, 尤其表现为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欧盟的分歧越来越大, 使得美欧盟友的离心力越来越大。

在国际体系中, 领导国家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定位的变化会牵动整个领导团体内其他国家战略的变化。当美国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一跃成为整个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时, 也就意味着欧盟这个原来阵营内的次级领导者的地位必然会相对下降。因此, 为应对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变化给欧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当美国选择了一个全球的战略定位而将欧盟的地位相对调低时, 欧盟作为次级领导者必然会寻求其他的力量来帮衬和突显自己的地位, 并在与其他力量的合作中提升其在体系中的重要性, 而在当时, 这个所谓其他力量的最优之选就是中国。

对于当时中国对欧盟的重要性, 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布里坦曾指出“中国的发展将塑造 21 世纪世界新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欧盟应制定长期、协调和独立的对华政策”<sup>[2]249</sup>。欧盟将中国定位为未来世界新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这体现出欧盟作为国际体系内的次级领导者对未来的国际体系所做的思考, 而在此时提前和中国发展关系则是为今后国际体系的变革打下基础。此外, 从布里坦副主席强调欧盟应制定独立的对华政策的谈话中可以看到, 欧盟希望通过发展欧中

独立关系来提升欧盟在体系中的重要性。欧盟与中国的接近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借重。

可见,在冷战结束后,美欧的关系就由 A + B 转向了 A - B。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战略地位的提升,欧盟在其国际体系战略定位中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希冀通过欧中战略借重来制衡美国一极独霸。欧盟和美国的疏远以及欧盟和中国关系的拉进使得当时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变为 A - B + C 的关系。因此,从这一阶段国际体系内主要力量中心的战略变动可以看出,中欧关系蜜月期内双方政治、经贸、科研合作等多领域内出现的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从根源上看是国际体系变动所带来的。

(三) 第三阶段: 2005 年至今,中欧关系的动荡阶段

中欧的蜜月甜蜜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2006 年,欧盟在发表《欧盟——中国: 紧密的伙伴,增长的责任》政策文件的同时,发表了《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 - 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贸易政策文件。文件中对中国的语气和态度发生了转变,并在开放市场、知识产权、人权问题、军费支出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了要求。此外,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换届完成,一些欧盟主要成员国开始推行对华“价值观外交”,大谈“中国责任论”,使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欧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问题都表明,双边关系甜蜜度开始下降、降温,并步入动荡阶段。

中欧关系甜蜜 10 年后突然降温,难免让人觉得蹊跷。例如,就欧盟某些成员国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而言,中欧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早已有之,为什么之前甜蜜时期这种差异没有成为双方关系的阻碍,而到这个阶段突然欧方开始大肆渲染这种差异并对中国加以指责。拨开这些纷乱的具体事务,就欧盟内部而言,这一时期欧盟制宪进程受阻,一体化进程前途不明,致使欧盟内部氛围非常紧张。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欧盟内部的因素决不是引起中欧关系动荡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真正引起中欧关系出现一系列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国际体系面临的转型。

随着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国内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家经济发展有所下滑。此时,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也逐渐意识到之前冷落盟友独霸天下战略的失误,而及时悬崖勒马转而加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战略磋商与协作犹未晚矣。美国战略的转变实际上是美国霸权力量衰落的表现,这预示着一极独霸的国际格局面临转型,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在

此时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实力指数下降,欧盟和中国的力量都有了较大的提升。此外,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都表明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政治悄然转型。对于欧盟而言,它所面临的战略选择有: 第一,追随当前体系的领导者与之修复关系回到最初的战略协作,即 A + B - C 模式; 第二,继续与新兴力量合作,并通过加强与这些新兴力量的协作,来制衡当前体系的领导者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即 B + C - A 模式; 第三,继续深化欧盟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自主行为能力,并继续塑造和培育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游离于领导者和新兴国家之间,即 A - B - C 模式。

此时,在欧盟对中国实力的评估中,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对其存在威胁的力量,并做出了 A + B - C 的选择。从欧盟的这种战略选择中,可以看出欧盟保守的立场和充满优越感的心态。对于欧盟而言,是要带头创造一种新的国际体系,还是留在旧的国际体系内维护既得利益? 欧盟的选择是保守的。在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下,欧盟作为次级领导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事务上分享领导权。因而,这也意味着其在制定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秩序等方面拥有优先的地位。

在美国霸权地位有所衰落,但是霸权机制依然正常运转的背景下,欧盟做出的这个选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欧盟通过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可以继续分享国际体系领导权,并通过与美国的合作牵制其他新兴力量的崛起,挫败其变革现有国际体系的行动; 另一方面,在维护欧盟旧有体系的同时,通过努力提升自身的实力,强化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以此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当然,除了国际体系转型博弈因素以外,欧盟选择与美国重修旧好并疏远中欧关系,还有其自身民族优越感的因素。历史上,欧洲一直是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这让欧洲人民深深引以为豪。这种优越感在其与对三级力量中心的认识和态度中可以清楚地发现: 抛开国际战略而言,欧洲人民在感情上更愿意选择靠近美国,而不是那些由“落后”、“蛮荒”发展而来的所谓新兴力量国家。因此,基于国际体系转型的种种矛盾与纷争,欧盟的战略定位发生转变,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变化,从而直接引起了最近几年中欧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动荡。

### 三、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转型下的欧盟对华政策

近年来,随着气候、金融、恐怖主义、国际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旧的国际体系协调和磋商机制面临严峻考验,领导集团的单独领导能力开始表现得越来越乏力,而新兴的力量主体在国际

事务中表现出越来越出色的行为能力。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期。例如,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国际政治、经济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从金融危机的治理措施上看,大国磋商机制从G8扩展到G20,这就再次证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能再由几个领导大国独断解决。新兴力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崭露头角的背后,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领导团体能力的相对弱化。未来10年,将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中欧都将作为国际体系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力量中心继续存在,欧盟对华政策将作出何种战略选择呢,这种战略选择又将会将中欧关系带向何方?

(一) 第一种选择: 如果国际体系继续维持A+B-C模式, 欧盟可能将继续留在A+B-C模式内

我们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欧盟目前的战略选择。在这种模式下美欧协作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而中欧关系仍然会相对疏远。美欧将继续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角色,也会继续将国际事务的重大决策权牢牢的抓在手中,维护现行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因此,国际体系的本质将是两大顶级的资本主义传统优势力量与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力量对比关系。这种对比和制衡关系,将使得双方在国际事务主导和决策权方面将存在分歧与斗争。但是,这种模式将维系的是美欧领导集团在国际高级事务方面的核心利益,并不会对双方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科研合作等低级政治事务造成较大的影响。当然,美欧领导集团为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挑战,将会利用其传统的政治、军事优势来巩固现有的国际体系,并在对待新兴力量的战略上采用一种更为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适当给予其国际话语权和行动权。但是他们必须保证的是新兴力量的国际话语权和行动权始终保持在欧美领导集团的知情和掌控之下。2011年3月,从美英法联军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主要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野心。虽然就欧盟内部来看,是否出兵攻打利比亚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欧盟与美国的盟友协作关系在本次事件中将进一步得到加强,美欧领导集团的向心力有所增加,并且这种形势会随着美国势力的衰落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因此,欧盟的战略重心开始上移,将热情和精力更多地投放在国际体系的领导团体合作上,努力将后起的新兴力量排挤在领导团体之外。如果未来几年继续维持目前的国际体系模式,那么中欧关系将继续面临挑战。A+B-C模式下,中欧要想回到之前“蜜月期”般火热的双边关系似乎不太可能,欧盟更多地会将中国在战略上视为潜在威胁对象,会更

紧密地靠向美国一边,通过巩固美欧关系来平衡实力增长中的中国。

(二) 第二种选择: 如果国际体系更迭为A-B-B模式, 欧盟未来可能将选择顺应A-B-B模式。A-B-B模式将是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的一种全新的组合模式

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虽然其在国际体系中其仍然是领导者A<sup>①</sup>[3],但是其领导能力将大幅下降,真正实力甚至可能由A下滑到B。而欧盟自身实力的提升,将会对国际体系的领导权产生更多的诉求,其对传统国际体系的离心力将增大。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并成功由C上升为B。为了谋取更多的国际体系主导权,也为了平衡三方逐渐相当的实力,欧盟很可能会选择游离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战略选择很可能顺应A-B-B模式。

对于欧盟而言,不断深化的一体化进程会增强其自主行为能力,而在经济一体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共同外交、共同防务也会取得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而大大增加了欧盟的自主行动能力,使其自我提升逐渐成为国际事务的自主行为主体。这可能会加大其疏远美国选择单干的可能性,以谋求更大的国际体系领导权。因此,这种战略定位可能导致其抛弃A+B组合。<sup>①</sup>目前,中国的实力仍然在不断增强,随着国内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个经济上更有实力、政治上更有影响力、文化上更有吸引力的二级力量中心可能会出现,由此,中国的战略地位将由C跃升到B。即时,在欧盟看来,A+B-C模式可能产生的将不再是捆绑的领导利益,而是左右为难的尴尬效应。基于美、欧、中三方力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盟的自主性和离心力会使得其极有可能选择顺应国际体系的A-B-B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际体系中的三个力量中心可能会产生既互相借重又相互保持距离的关系。基于此,欧盟对华政策将带给中欧相互抗争且相敬如宾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在国际体系力量中心组合模式的转型下,欧盟对华政策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未来中欧关系的走向将继续受到国际体系转型的深刻影响。中欧关系是好,还是坏,均会受欧盟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判断和选择的深刻影响。但是,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现状来看,欧盟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欧盟成员国深陷债

<sup>①</sup> 根据霸权稳定论,霸权国建立起的国际霸权机制在短期内不会随着霸权的衰落而崩溃;霸权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会相应的提供公共物品,维系现行的国际机制。

务危机,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出台和推行都较为坎坷,欧洲防务建设阻力重重等。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欧盟作为国际社会独立行为体的行为能力严重不足,一个跛脚的巨人要想单独做出改天换地的事情实属困难。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欧盟的最优选择仍然是 A + B - C 模式,而在此模式下,中欧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必将绵延不断。因为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和中国日益增加的力量均会让欧盟对华政策的苛刻和指责有所收敛,所以中欧关系即使回不到“蜜月”,但也不至于走到“离婚”。

[ 参 考 文 献 ]

- [1] 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M]. 信 强,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106.
- [2] 关呈远. 零距离解读欧盟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47.
- [3]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M]. 苏长和,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256. (责任编辑:冯 蓉)

**An Analysis of Policy of European Union on China in a View Angl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LIU Xue-lian , ZHANG Juan

(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12 , China)

**Abstract** In the 30-plus year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 EU ) on China , three changes of stage nature have taken place , getting mature gradually. From a view angl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we analyze four modes of the grouping of the center of the strength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the cold war. From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of the EU on China , we further expound the change of the grouping mode in question and the different results of the policy caused. Based on the above , we forecas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cy of the EU on China in the future 10 year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ength center grouping mode; EU policy on China; Sino-European relation

---

( 上接第 71 页)

**Interest Adjustment of Subjects and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legal basis of interprovincial coordination

CHEN De-min , DONG Zheng-ai

( School of Law , Chongqing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030 , China)

**Abstract** Fairness and justice are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 which is in pursui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 and that between huma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ue to the hampering of the interprovincial interest conflicts game containing and the limitation of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disjointed incrementalism of the government ,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basin is grave such that it is very har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interprovincial interest balance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degrees. With the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 it is needed not only to actively rectify the deviation on the decision-making mode , but , more importantly , to practically tackle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legal norms , follow the basic lines of the repressive law-autonomous law-responding law and make proactive response to various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ith the responsible legal norms.

**Key words**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decision-making; legal norm